

利益协调与政治稳定

——西塞罗的混合政体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胡琦

(重庆行政学院 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重庆 400041)

[摘要]西塞罗认为混合政体具有保障人民权利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佳政体。他强调混合政体在制度上协调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融通贵族的权威与平民的自由权利,从而发挥了消弭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利益纷争、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作用。西塞罗的混合政体其本质是通过社会各阶层共享权力,建立利益均衡的社会关系,从而实现政治稳定,使利益协调取代以权制权成为实现政治稳定的新模式。因此,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发挥国家机制与社会机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政府权威保证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开展社会建设协调社会利益。

[关键词]西塞罗;混合政体;利益均衡;社会公平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3-0043-07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Cicero's Thought of Mixed Constitution and Its Realistic Value

HU Qi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Chongqing Academy of Governance, Chongqing 400041, China)

Abstract: Cicero believes that mixed constitution has the value of safeguarding people's rights and social justice, and is the best regime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order. His thought of mixed constitution emphasizes the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of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s Congress, taking account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rights of the common people, resolving interests dispute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levels, and coordinating public interests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The essence of Cicero's mixed constitution is to achieve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 sharing social power and establishing social relations of balanced interests. Coordination of interests, instead of restricting right with power, has become a new mode of realizing political stability. Therefore, in a highly differentiated society, the dual role of state and social mechanisms should be exerted to maintain political stability. On the one hand, government authority should guarantee the public interest;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coordinate social interests through soci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Cicero; mixed constitution; balance of interests; social justice

在西方古典时代,围绕着如何组织国家政权这一核心问题,一些思想家提出了深刻的政体理论,直到今天,其思想对认识我国当前的现实政治亦不

乏重大的参考价值。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古典时期的政体理论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1-4]西方古典政体理论中,西塞罗的混合政体

理论突破了古希腊狭隘的城邦观念,深入探讨了利益分化社会中的政治稳定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一 混合政体:国家的最优政体形式

欲探明西塞罗的混合政体思想必先明确他的国家理论。西塞罗国家学说的要义集中在《论共和国》《论法律》两篇对话录之中。在《论共和国》中,他借斯基皮奥(Scipio)之口界定了国家的涵义,指出:“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但人民不是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权利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5]29}这个定义的核心观点强调“国家是人民的事业”,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来源与基础。西塞罗对国家的定义与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界定存在共通之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3卷的开篇追问:“什么是城邦?”接下来,他指出:“城邦是公民的实体,因此我们必须探究何人应该被称为公民,以及公民是什么。”^{[6]109}显然,亚里士多德把公民视为城邦最基本的要素,以此为基础分析城邦的涵义。西塞罗同样以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作为分析国家本质的基础。

“人民”的概念在西塞罗的国家观中占据中心地位。他所指的“人民”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人民是以权利为基础的共同体,而人民的权利以法律为保障。由于法律背后蕴含着“正义”的价值,因此西塞罗强调人应该追求正义的价值。他把人民看作“是一种建立在正义与法治之上特定的政治共同体”。^[7]正义的观念曾经占据西方古典时代法哲学思想的中心地位,被作为国家合理性的伦理基础,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正义是城邦的本质所在。西塞罗继承并延续了这种传统,从道德合理性的角度阐释国家的涵义,强调国家应建立在“正义”“善”等道德前提之上。二是人民是以追求“共同的利益”为目的而形成的共同体。西塞罗将其预设为共同体追求的目标以及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国家篇》中,他用拉丁语 *res public* 表达国家的涵义。这个词原意指“公共的事务或财产”,后来逐渐与英文 *commonwealth* 一词对应,表示国家权力为公共所有物,国家治理是所有公民共同的事业。

西塞罗国家观念的核心涵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民是公共权力的来源与基础。在共和国中,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是政府权力的委托人,而那些接受人民委托的人必须尽力服务于人

民的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西塞罗指出:政府的责任是顾全人民与国家的利益,“要想担任政府公职的那些人不应忘记柏拉图所说的两条戒律:第一条,要一心只考虑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的得失,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符合人民的利益;第二条,要顾全国家的整体利益,不要只为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服务而辜负其余的人。政府的行政部门应当像信托事务管理局一样,总是为委托的一方而不是为受托的一方着想”。^{[8]129}另一方面,公平正义是国家的本质所在。正义的价值表现为共和国内部各种利益协调一致,各个阶层能够和谐共存,从而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由上、中、下各种阶层协调意见组成的国家也像声乐一样,靠各种不同因素的协和一致而发出协调的奏鸣。歌唱时音乐家们称之为和谐的东西,在国家中称之为和睦,这是每个国家的一种最紧密、最牢固的安全纽带,并且如果没有正义,它便怎么也不可能存在。”^{[9]98}

西塞罗的国家理论奠定了其政体学说的基础。他根据统治者的人数区分了3种不同类型的政体形式:君主政体(*regnum*)、贵族政体(*civitasoptimatum*)和民主政体(*civitaspopularis*)。“当全部事务的最高权力为一人掌握时,我们称这位唯一的掌权者为君主,我们称这样的国家政体为王政。当全部事务的最高权力为一些挑选出来的人掌握时,我们称这样的城邦为贵族意志统治。人民的城邦的涵义即是它的一切权力归于人民。”^{[5]30-31}其次,他依据政体是否符合“正义”价值、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以及是否满足各阶层人民的利益诉求的标准,指出上述3种政体皆非最优政体。“在王政制下,其他人被过分地排除在公共司法和协议之外;在贵族统治下,民众未必能享受到自由,因为他们被剥夺了参与任何公共审议和行使权力的可能;当一切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时,即使是公正和温和的,但既然不存在任何地位等级,公平本身仍然是不公平的。”^{[5]31}由于各自存在缺陷,这些政体并不稳定,容易蜕变为相应的变态政体形式:君主制变为僭主制,贵族制变为寡头制,民主制变为暴民政治。他认为完美统治体现在依理性而治的公正、明智的君主身上,由于现实生活缺少理想政体存在的基础,这种理想的政体不可能实现,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最完善的国家体制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那种体制”^{[9]229}。而罗马人祖先遗留于世的共和制就是将3种单一政体结合而成的混合政体。在他看来,只有中庸、平衡的混合政体能够克服

单一政体的弊端,成为现实中的最优政体。

二 自由与权威的融通:混合政体的制度内核

西塞罗的混合政体在制度上体现为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协调统一,其深层次涵义是融通贵族权威与人民自由,使社会阶层分享权力,平衡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

(一)混合政体在制度结构上体现了融通贵族权威与人民自由的特征

西塞罗认为,从制度结构来看,混合政体是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3种政体的混合。三者分别体现在执政官、元老院与公民大会3个机构之上。尽管执政官、元老院与公民大会三者缺一不可,但它们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分工与职责不同,不同的权能被赋予不同的机构,并且3种机构的权力不对等。他指出:“如果元老院处于国事协商的主导地位……而如果其他等级希望国家根据第一等级的意见进行管理,那么这种有节制的、和谐的国家政体便可以通过法权的适当分配来维持,即权力属于人民,元老院享有权威。”^{[5]229}

从深层次原因来讲,西塞罗强调混合政体融通权威与自由的思想来自于其自然法思想,其根本目的是建构稳定的政治秩序。

首先,元老院的权威是维系国家政治秩序的根基。他指出,当政治体制内部爆发权力冲突时,元老院扮演裁判员的角色,为国家提供指导与建议,对人民进行教育。西塞罗无疑把元老院作为稳定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石。“元老院是国家的监护人、首领以及捍卫者。我们的祖先希望执政官由(贵族元老)这个等级的权威来指导,执政官的行动应当像这个伟大的议事会的执行者。还有,他们希望元老院本身应当得到那些直接居于他们之后的那些有威望等级的支持,他们应当做好准备,保护和扩大公共的自由和利益。”^{[10]270-271}他主张捍卫元老院的地位的观点典型地表现在“喀提林阴谋”案之中。尽管有派系斗争之嫌,但骑士出生的西塞罗始终站在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贵族的一边,极力地维护作为共和国象征的元老院的权威。一方面打击民主派的势力,反对保民官提出设立“十人委员会”掌握最高权力的建议;另一方面压制新兴贵族势力对元老院权威的挑战,毫不留情地处决“喀提林阴谋”的参与者。他在元老院中大声疾呼尽力拯救共和国,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挽救你们(元老们)自己、

子女、财产,捍卫罗马人民的名誉和安全”,元老们必须对谋反之人残酷地处以极刑。他声辩道:他的建议不是为了自己个人,而是“为了使你们(元老院)能够保存下来”。因为整个国家和所有公民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财产托付给了元老院。^{[11]212-213}毋庸置疑,他认为动摇元老院的地位就是破坏整个共和国的政治秩序。

其次,协调权威与自由是自然法的客观要求。西塞罗认为人民的自由权利与法律相辅相成。各种权利义务通过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他指出:“法律(lex)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实现,便是法律。”^{[5]189}在他看来,法律以自然法为基础,是人的理性与正义的具体体现,是社会生活必须遵守的规则。“真正的法律乃是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吻合,适用于所有的人,稳定,恒常。”^{[12]251}这就意味着守法成为全体公民的义务。正是因为法律是稳定永恒的规范,所以法律拥有至上的地位,它能保障人民得享自由和权利,能奠定人民作为国家权力来源的基础。

最后,西塞罗区分了实在法与自然法,强调实在法要以自然法为根据。他认为诸如《十二铜表法》及梭伦的法令都是合乎自然法的典范,其奠定了法律制约权力的理论基础。在法律的统领下,国家的公共权力应以法律为准绳,一切权力要授之于法,施之于法。一方面,法律强调权力虽然来源于人民的赞同,但是人民并不能为所欲为。萨拜因评论指出:西塞罗的一般治理原则是“权力来自于人民,权力只应当通过法律来保证实施”^[13]。另一方面,法律既是元老院获得权威的来源,又是限制元老院权力、保障人民自由的手段。他认为,素质一般的人自愿接受那些杰出的人掌权便是尊崇自然法。基于西塞罗的自然法观念,元老院的决议、行政官的执行权以及法院的审判都应以法律为基础。如他所言:“我们无论是以元老院的决议或是以人民的决议都不可能摆脱这种法律的束缚,无需寻找说明者和阐释者。”^{[12]251}元老院权威的本质不是指元老院具备命令式的强制力,而是指元老院通过建议、指导与教育等方式对人民形成的影响力。元老院并不可以乱施权力,剥夺人权与自由。

(二)融通权威与自由的本质是社会阶层共享权力

西塞罗主张混合政体应当协调元老院与公民

大会权力,融通贵族的权威与人民的自由。这些观点是他深入研究罗马共和国社会经济现实后所得出来的成果。西塞罗正视社会不平等的客观事实,对人人绝对平等持悲观态度。在《共和国》中,他借西庇欧之口指出,一个政体只有保证了人民的自由权利才能现实“数量上的平等”。与此同时,他又指出,“数量上的平等”对贵族来说“特别不平等”。贵族与民众之间有着天然之别。他指出:“那些既没有犯罪也没有邪恶品性的人,不狂暴的人、不会在家庭里受到麻烦困扰的人,全都是‘贵族’……相反,民众中的许多人意识到自己的罪行,担心受到惩罚而想发起革命和改变政府;或者有某种天生的精神错乱导致对公民不睦和颠覆活动感到心满意足,或者说有些人生来就喜欢造反、内乱和分裂。”^{[10]250-251}基于这种看法,他认为整个社会可分为3个等级:最高等级是元老院,接下来是骑士,民众天生就是暴动者,因而处于社会最底层。

基于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西塞罗对混合政体与政治稳定关系提出了独特的观点。为了保证公平,不同社会等级所获得的权力、荣誉应当不平等。他指出的:“当地位崇高的人和地位低下的人享有同等荣誉时,这种公平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公平。”^{[12]93}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要保持稳定的状态,就要使国家的“权利、义务和职责公平分配,使官员们拥有足够的权力,杰出人们的意见具有足够的威望,人民享有足够的自由”^{[12]187}。在混合政体中,社会不同等级的利益差异与地位的不平等体现为执政官、元老院与公民大会的权力处于不对等地位。一些职权体现了王政的因素,一些事务托付给拥有至上权威的元老院,一些事情留给民众在公民大会中协商。西塞罗十分赞赏图利乌斯在规划公民大会的选举程序时确立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让大部分人获得大部分权力。换言之,他让各个等级享有的权利不一样,使得表决的结果不依赖于普通人,而是依赖于富人。^{[9]82-83}权力分散于代表不同社会等级的机构之中,实质上是使社会各等级间相互妥协从而达到利益均衡的状态。

很显然,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虽然具有分权思想,但这不是现代“三权分立”式的分权;现代的“三权分立”表示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间的权力制衡,国家政体中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都代表着人民主权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西塞罗分权思想的核心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分权,因为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执政

官不代表整体利益,而是各自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在他看来,混合政体之所以能够推进政治稳定,不是因为它使权力制约权力实现权力制衡,而是因为它保证所有阶层的公民拥有和分享公共权力,使具有利益差异的社会阶层共同参与公共政治,为国家的公共利益献身。混合政体的目的就是使权威与自由协调共存,维持社会阶层的权力平衡,从而建立均衡稳定的政治秩序。西塞罗的混合政体思想表明应该从社会关系入手寻找保障政治稳定的着力点;国家可以通过使社会等级的多元利益协调一致的途径,达到实现政治稳定的目标。

三 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统一:混合政体的精神内涵

西方古典时代的政治学家认识到纷繁复杂的城邦政治背后隐藏的一个本质问题,即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他们关于如何避免权力腐败,建构政治秩序的观点,建立在其有关个体与集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思想之上。亚里斯多德奉行“城邦中心主义”或者说“共同体本位”的思想,认为“人于城邦生活中完成德性时,是最良善的动物;但若背离法律与正义,就会堕落成凶恶的动物”。^{[6]9}这种观点强调共同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它所揭示的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逻辑是个人从属于集体。公民个人消融在城邦整体之中,相对于城邦毫无自主性可言。随着希腊城邦的崩溃,亚里士多德式的城邦至上观念开始松动,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思想流派在古罗马时期呈现出来。伊壁鸠鲁派的学说强调个体相对于政治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受其影响,西塞罗在将公共利益作为共同体基础原则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他认为,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时,混合政体是协调两者关系的有效制度形式。

(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两者不可或缺

西塞罗以自然法理论统领自己的政治学说。从自然法的角度出发,强调人性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他指出“自然赋予人类两种角色”:一种角色是共同的,人们共同享有理性,从而优于野兽,“这是一切道德品行与礼节的起源”;另一种角色赋予个人,由人与人之间个性与身体差异所致。因此,一方面,人类普遍拥有语言与理性的天赋,人

们所要利用的一切应该“保持其公共性”,从而形成人类社会,^{[14]53}且理性形成人们所普遍遵循的永恒美德,在美德面前,人与人完全一致并且平等;另一方面,人因出生、身体、智力、财富等个体差异而具有个性,在遵守自然理性的前提下,不同的人根据具体的形势运用美德以达到最适合个人角色的目的。正是由于人性的双重性质,由人所构成的共同体既强调维护公共利益,又强调追求个人利益。

西塞罗认为在共同体中维护公共利益符合自然理性,共同体与公共生活的形成是人的自然理性的表现。“在人类与兽类之间的许多不同点中,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然赋予人以理性的天赋……正是理性……激发人从友谊和亲情开始扩张自己的兴趣,先与同胞形成社会纽带,然后与全人类建立社会关系。”^[15]上帝赋予了人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理性与语言能力,正是人的这种天赋的、自然的理性能力形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纽带,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尊重、保护与维持整个人类的共同团结和友好关系”。^{[14]143}因此,公民追求公共利益源自于人的自然本性,也是公民的义务与责任;个人在共同体中始终不能背离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实现政治共同体的稳定秩序的根基所在。正如尼尔·伍德所指出:“当一个人行事一心只为自身利益,而不为别人的安全与福利计,那么关系到这个人的生活与幸福的社会则从长远来看会被严重削弱。”^{[16]75}

同时,西塞罗不否认共同体中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他指出:“私有财产来源于战争,或者根据法律、契约、协议、阉签等方式获得。”^{[14]21}私有财产虽然不是自然产生的,但其存在是合法的,因此,受到法律保护,不容他人任意地摄取。国家必须保证人民的“物权”,任何人“都不能打着国家的旗号侵犯平民百姓的财产权”,“建立立宪国家和自治政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人的财产权”。^{[8]202}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他坚决“捍卫财产权”,反对民主派领袖格拉古兄弟所推行的限制土地集中,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

西塞罗的思想建基于罗马共和国后期的政治社会环境之上。在这个时期,政治精英们为了权力与财富展开激烈政治斗争,政治暴力时有发生,家族命运疾风骤雨般兴替。西塞罗清醒地认识到人们追求私人财富与权力的生活方式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共存,他主张通过彰显公民的德性以限制人的私欲。他认为公民要

心怀“正义”的美德,“在自然正义的界限之内,照看私人利益以及追逐利润”。^{[16]114-115}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应当止于社会正义。此外,他还认为人还要具有“节制”的美德,要克制一己之私欲,以公共利益为重。他认为利益由于高尚而有意义,每个人都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要那样做不伤害他人的利益。^{[14]283}在他看来,混合政体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正义与节制的美德成为公民的行为准则,从而使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协调统一。

(二)混合政体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统一的制度保障

混合政体是促进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实现公民美德的制度保障。西塞罗认为,自然虽然赋予人们强烈的德性追求,然而美德的存在全赖于对美德的运用,其最好的运用便是管理国家。^{[12]19}共和国作为“人民的财产”,建基于公共利益,为了公共利益,遵循公共利益。理想中的最优的国家管理者就是为全体公民利益服务的人。“对于这位共和国管理者来说,目的是要使公民们生活幸福,使公民们的生活财源充足,财富充裕,因赞誉而荣耀,因德性而尊贵。我希望他是世间这一最伟大、最美好的工程缔造者。”^{[12]309}因此,管理国家就是指公民要积极地投身于公共事务之中,为公共利益服务。他们参与共和国事务的形式有两种类型:一是参与公民大会的决策过程,一是参与行政长官和元老院议员的选举过程。混合政体的优点在于能够使各等级公民都有机会成为国家的官吏,都能够被赋予参与公共事务和管理国家的权力。在混合政体中,不同机构的管理者交叉实施权力。“执政官、大法官、人民主官、骑兵主官,以及由元老院任命的进行执政选举的官员有权主持人民集会和元老院。由平民挑选的保民官有主持元老院的权利,并裁判为平民所必要的任何事务。”^[17]混合政体形成一种政治机制,将公民吸纳进入政治统治的同时,元老院的权威能够保障共和国的平衡,也可以防止大众民主造成的暴民政治。正是这样,西塞罗对罗马共和政体引以为豪,认为这是一种最明智、最公平的均衡体制,为各等级的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平台。

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西塞罗认为,公民是指在共同体中拥有平等地位的自由人,其在本质上代表身份与权利。^[18]他指出:“要是公民们不愿意均等财富,要是

人们的才能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起码应该在权利方面是相互平等的。”^{[12]89}公民的平等地位建立在他享有各项法律权利的基础之上,这些权利包括财产权、公民权和政治权。公民积极的政治生活是他们达到个人目的、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而混合政体有着实现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功能。

西塞罗强调罗马共和政体“不是靠一个人的智慧,而是靠许多人的智慧。不是由一代人,而是经过数个世纪,由数代人建立的”^{[12]129}。从王政到共和国,混合政体最终形成了国王、贵族、平民分享政治权力的政治结构,这使各等级在合作的基础之上认同对方的权利。^[19]因此,混合政体使个体免于完全淹没于政治社会的整体之中。公民追求个人利益时,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因而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条件。于是,基于混合政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看似矛盾的两端被协调统一起来;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虽分殊各异,但融于一体。

四 结论:利益均衡与政治稳定相辅相成

西塞罗处于罗马共和国崩溃的前夕,整个社会利益分化严重。由于社会利益调节机制的失灵与缺失,社会的利益分配失去平衡。他的混合政体思想积极回应时代变革中的世情民风,深刻地揭示了影响政治稳定的本质因素是社会利益关系。政治失序在日常生活中以各社会等级之间利益纷争的面貌呈现出来,抽象地表现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纠葛,以及国家政体中各机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利益因素出发,西塞罗认为国家政制的权力结构应该围绕着社会利益关系建立,利益均衡与政治稳定相辅相成,政治稳定必须建立在社会利益均衡的基础之上。其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利益冲突是影响政治稳定的症结所在。西塞罗认识到各社会等级难以绝对平等,利益冲突是社会的常态。透过现实的迷雾,他洞悉到罗马共和国危机的症结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惨烈的利益斗争,因此,他强调建立混合政体保障利益均衡,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西塞罗所主张的利益均衡奉行相对平等的原则,他严格地把社会平等与平均主义区分开来,认为社会平等并不等同于社会等级之间完全无差异化。正是由于贵族与平民两个等级在财富、身份、天赋、才能等方面事实上的差异,他们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被赋予了不同的职权。贵

族作为领导阶层掌控权威,成为利益冲突的调解器与控制器,保证各社会阶层的团结,从而促进国家的稳定。基于相对平等的原则,西塞罗对各等级的差异设置了界限,强调通过权力、道德等节制手段限制各个社会等级的宗派利益,阻止宗派斗争,从而达到国家政治稳定的目的。

第二,政治稳定的基本途径在于利益协调。西方古典政治学家的混合政体思想对解决政治稳定问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方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着眼于城邦公民的“德性”,他们认为政体的目标就是追求“善”业,因而强调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公民美德对实现城邦正义的重要性。西塞罗则着眼于各社会等级的利益,主张通过适当分散权力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均衡。分散权力包括国家各机构部门之间的分权对抗,以及权力分散于社会各等级之中两种形式。西塞罗没有采取权力机构之间分权对抗的方式,因为他深知政治机构之间“冰冷无情”的权力对抗虽可达到制衡稳定的目标,但也难免会陷入部门利益之争。为了避免此种恶果,他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层面入手探讨了社会等级的性质,认为权力分散的着力点在于平民与贵族共享权力。共享权力的基本涵义是:在维系公共利益的目标下,平民与贵族通过分享权力,有序地进行利益表达,共同参与国家治理,协调利益冲突,从而实现利益均衡,维护政治社会的自由与稳定。西塞罗强调:混合政体恰恰可以在不同的阶级势力之间创造一种和谐与灵活的平衡,也就是把有财产的少数人的利益同无财产的多数人的利益加以协调。当然在这样做时,财产与元老院被置于国家权力的中心。^[20]总之,西塞罗在混合政体的制度平台上建构了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实现了以权力制衡为手段的维稳模式向以利益协调为手段的维稳模式转变。

第三,维持政治稳定与维护人民权利不矛盾。西塞罗的混合政体理论彰显了个人权利的神圣性,他的义利观走的是一种中间道路,即既保护人的正当私权,又防止人的私欲扩张。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统一,既不能假借维护政治稳定之名损害个人权利,也不能容忍以个人权利之名破坏政治秩序,他虽然肯定政治权威对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但强调政治权威要遵循民意,依法而治;通过法治手段,政治权威激发人民的政治自主性,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可见,公共权力、人民权利和政治稳定三者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西塞罗的混合政体思想的中心主题是如何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他的思想始终围绕着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因此,他十分关注个人与共同体关系及公民权利与义务等问题。放眼当下,这些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有着相通之处。协调社会中的多元利益和建立利益均衡机制是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现实社会中矛盾与冲突多以民众参与以及利益表达的面貌呈现出来,社会稳定问题与民众利益表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塞罗在论述混合政体中所涉及到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问题、自由与权威关系问题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在探索的重大课题。

西塞罗的思想对实现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在利益多元化社会中,维持政治稳定的根本之道在于利益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统治中,建立起社会各阶层的权力分享机制,畅通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为利益协调与利益均衡奠定基础。二是在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社会中,提升政府执行力,树立政府权威,增强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这对保障利益均衡与政治稳定至关重要。三是应发挥国家与社会的双重作用。政府在维稳过程中,要运用政治权威的影响力,但不能滥施政治权力;如果片面地强调国家权力的运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反而容易导致以权执法及侵害个人权利的现象,不利于政治稳定,不利于社会长治久安。因此,通过社会机制与政治机制相互配合,以社会建设促进政治稳定,既能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又能形成维稳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 [1] 杨光斌. 政体理论的回归与超越:建构一种超越“左”右的民主观[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4):2-15.
- [2] 刘训练. 西方古典政体学说及其影响与意义[J]. 政治学研究,2013(2):111-121.
- [3] 刘训练. 亚里士多德论混合政体[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8):96-103.
- [4] 曾毅. 政体理论重述[J]. 社会科学研究,2014(3):39-51.
- [5] 西塞罗. 论共和国[M]. 王焕生,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9.
- [6]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7] SCHOLFIELD M. Cicero's Definition of Res Publica[M]// POWELL J. G. F. Cicero the Philosoph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5:69.
- [8] 西塞罗. 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M]. 徐奕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 [9] 西塞罗. 论共和国 论法律[M]. 王焕生,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 [10] 西塞罗. 西塞罗全集(演说词卷):下[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11] 西塞罗. 反喀提林阴谋[M]//撒路斯特乌斯. 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 王以铸,崔妙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2] 西塞罗. 论共和国[M]. 王焕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13] 乔治·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M]. 邓正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3.
- [14] 西塞罗. 论义务[M]. 王焕生,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 [15] 西塞罗. 论至善与至恶的界限[M]. 石敏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9.
- [16] WOOD N. Cicero'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75.
- [17] 西塞罗. 国家篇法律篇[M]. 沈叔平,苏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28.
- [18] BUTTLE N. Republican Constitutionalism: A Roman Ideal[J].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2001,9(3):331-349.
- [19] ASMIS E. A New Kind of Model: Cicero's Roman Constitution in De Republica[J].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2005,126(3):377-416.
- [20] EHRENBERG J. Civil Society: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An Idea[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23-25.

责任编辑:蔡燕飞